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中山舰事件的内幕	马文车(1)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8)
“马日事变”亲历记	魏 镇(15)
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	梅 原(33)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攻	谢慕韩(61)
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	李家白(68)
我参加第二次“围剿”被俘脱逃记	公秉藩(72)
孙连仲投蒋和在江西与红军作战失败的经过	赵大璞(88)
刘和鼎部在建宁被歼的回忆	郑 正(96)
参加十九路军在江西“围剿”的回忆	李汉冲(101)
蒋军王金钰、上官云相部在江西被歼纪实	李大同(109)
蒋军赣州守城战役亲历记	马 崑(126)
陈济棠进攻筠门岭红军的经过	曾其清(133)
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攻纪略	宋瑞珂(141)
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	戴 岳(153)

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	杨伯涛(161)
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	宋希濂(175)
我所知道的改组派	范予遂(186)
国民党的魔影——“CC”团	刘不同(206)

中山舰事件的内幕

马文车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的前一年，1925年8月进行第二次东征时，我在东征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同年年底，二次东征结束，所有高级官佐大多调至卫戍总司令部，我则由蒋介石亲拟电稿致国民政府，推荐为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常来往于汕穗之间。此时，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卫戍总司令等职。他利用亲信爪牙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兹就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追述如下。

一 东征结束后广东政局概况

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统一了广东，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逐渐壮大起来，他的政治野心也就从此更大。因此，当时在军政领导方面就存在着以下矛盾：（一）蒋介石同汪精卫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二）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因工作关系彼此经常接触，有着一定的交谊。蒋、汪都是政治野心家，为了互相利用，结成换帖兄弟。蒋称汪为“季兄”，汪称蒋为“介弟”。

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时又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虽在表面上予以辅翊，面在骨子里则是别有用心。但是汪精卫善于笼络元老派，一面又假

惺惺地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故在当时尚有一定政治声誉。因此，汪就想大权独揽，特别是在人事任用方面，几乎一手包办，不会征求蒋的意见。于是，蒋介石为了同汪对抗，就在黄埔军校组成了一个所谓“孙文主义学会”，其中主要成员有教育长王柏龄，学生邓文仪、贺衷寒、缪斌等。后来，所有蒋的亲信，如陈肇英、欧阳格、徐桴、陈策、吴铁城等也都成为该会的重要分子。当该会成立之初，王、陈、吴等虽也曾请汪精卫去讲讲话，表面上装作对汪尊重，背后却经常造谣，挑拨离间，企图造成政局不安，并且支持蒋介石反俄、反共，其中最恶毒的是王柏龄。

当年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心情是：一则恐惧，二则怀恨。因为蒋自认为“唯一军事家”，深知“有了军权就有了一切”。他在军事上植势之后，就一意孤行，要想实施独裁制度，压制民主，在一切措施上，一贯蒙蔽和欺骗群众。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高，他很害怕共产党员会在军队里深得人心，由猜忌而恐惧而怀恨。所以在东征结束后，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企图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原由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方面，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二 蒋介石阴谋制造“事变”

由于以上两种矛盾的存在，蒋介石蓄意兴风作浪，企图反俄、反共；同时打击汪精卫，使他应付困难，以利于排除异己，夺取领导地位。有名的中山舰“政变”事件，于是发生。“政变”的制造者，其实就是蒋介石；参加策划的则有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王柏龄、陈肇英、徐桴、欧阳格、吴铁城、陈策、缪斌等。

陈肇英也是蒋介石的换帖兄弟，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情谊很深，是当时蒋的心腹人物之一。他职充虎门要塞司令，手下拥有几艘兵舰，平时常常假借职权，利用兵舰大做走私生意，获利甚多。当时有李之龙者，系海军局局长，品质超凡，作风正派。他发现

陈肇英以兵舰走私一事之后，深为愤慨，就向汪精卫报告，经汪批准，由李出动海军制止，曾经将其人货一并扣留在海军局。由此，陈肇英与李之龙结下怨仇，就想寻事报复。

当蒋介石蓄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乘乱屠杀共产党员，同时逼走汪精卫的时候，陈肇英为了陷害李之龙，就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怂恿，推波助澜。大约是在蒋、陈和上述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通过密室策划后，隔不了几天，在3月17日早晨，从黄埔军校发出了惊人的谣言，说是“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谣传散布，引起人心不安，叫喊得最为热烈的是王柏龄，他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兼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三 “事变”的经过

3月17日黎明，蒋介石突然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广州东堤八旗会馆——卫戍总司令部（原东征军总部）。前一天，我刚从汕头回到广州，因眷属尚在汕头，宿在该部秘书长房间里。他进入办公室同我碰面，我看他这次没有带便衣卫队，而其神气有些紧张。正在猜想间，他先问我：“你有没有听到特别情况？”

我答：“没有。”问他：“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说：“中山舰开到黄埔，有阴谋。”

我说：“我没听到，是不是需要了解一下？”

他说：“不需要，我要回家看看。”说罢，就坐了汽车回东山公馆去了。

3月18、19两天，我都在卫戍总部休息，未曾出外。19日深夜时分（大约已11时左右），我已就寝，忽然由经理处派来了汽车来接我，要我马上去经理处见蒋校长，刻不容缓。经理处在广州火车站附近，我到达时，看到刘峙和蒋鼎文、惠东昇两个团长都在；还有陈肇英、徐桴、欧阳格等亦在座。蒋对我的说话很简单，只说：“今晚要戒严，卫戍总司令部的印信在哪里？”其时，卫戍总部因东征军总

部成立后,大部分人员都已调开,仅留参谋长李章达及少数职员。我去汕头五、六个月才回来,情况亦已有些隔膜。我随口回答:“印信已不归我管,总在卫戍总部吧。”他要我立即去找来。于是我又赶回卫戍总部,唤醒有关职员,拿到印信交由蒋的侍从书记吴家旒送到经理处去。正在此时,卫戍总部参谋长李章达来电话询问:“今晚为什么要戒严?”我回答不知。李又说:“请你问问校长。”于是我又到了经理处,打听戒严原因。据欧阳格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进黄埔,劫去蒋校长,送往海参崴转送莫斯科,该舰已于昨日窜泊黄埔水面,事态十分严重。刘峙和两个团长是前来接受命令部署军事行动的。”

戒严是在深夜12时开始的。其时蒋介石就在经理处亲作严密布置:他以兼卫戍总司令的职权,调动了较多的武装部队,而其主要的兵力却放在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派惠东昇负责,以惠的全团兵力再加上广州公安局的武装警察,执行这一任务;出动时个个枪膛实弹,枪头上了刺刀,准备厮杀。派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一部分武装警察,执行包围汪精卫住宅的任务,名义上称为“保护”。派蒋鼎文率部占领海军局,解除该局的武装力量。派陈肇英和欧阳格率部逮捕海军局长李之龙,并指定欧阳格兼负劫夺中山舰任务,并令暂代该舰舰长。蒋介石又亲自以电话命令第一军亲信的各师、团长,要他们将各该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刘峙率部配合这一行动。蒋布置完毕,又匆忙地接见了滇军将领朱培德,密谈了约半小时,内容不详。朱辞出,已是后半夜2点多钟了。蒋即从经理处潜往造币厂(惠团团部所在地)隐匿。因为该处地段较为静僻,当时知道他所在的只有我和经理处处长徐樾。蒋走时,叫我仍回卫戍总部坐守,听到什么情况,随时打电话给他。

到3月20日早晨止,广州没有发现大量的火药气味,这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后得悉:是晚亏得共产党机关和共产党领导人都能镇静从事,对惠团兵员及武装警察的骚扰,甚至于有个别开

枪射击的，共产党机关绝对不予回击。这样一来，就逼使惠团官兵无法滋事。

戒严一直持续到3月20日上午，还没有停止。那时我在卫戍总司令部，深感此事没有如此严重的必要，并且这次“戒严”又没有通过国民政府。因此我想去看看汪精卫，但是汪的住宅已在“保护”的名义下受了包围，并且是蒋所不满的，不便前往。次而想起谭延闿，平素比较为蒋所尊重，因此我就到了谭宅（20日上午7时许）。谭问起“戒严”之事，他认为事态搞得太严重了，应该及时挽回，并且表示很想和蒋介石谈一谈，问我蒋校长现在何处。我不便即时据实告知，只说待我去联系一下即来回话。予是我又回到卫戍总司令部，与蒋摇通电话，告以谭的意见，蒋表示愿意和他谈谈。我又立刻赶去谭宅，和谭同车至蒋处。蒋在接见谭时，神色很镇定，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允即下令通知解严，并将惠东昇一团调回造币厂，暂负“侍卫”之责。

此时，蒋的亲信缪斌进来向蒋报告：“所有第一军的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已于一律扣押。”蒋在当时不作表示。谭和缪斌走后不久，惠东昇的部队刚开到，就有何香凝及周恩来相继而至。周等坐候多时，蒋始出而接谈。这时，惠东昇在大门口把守，竟将周的汽车上卫兵的枪械缴去。惠对我说：“看他进得来，就出不去。”我说，“未奉令而缴枪，是违反军纪。你把事情看错了。”接着惠东昇得知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就将枪支发还。何、周二位和蒋所谈内容，我不清楚。在当日（20日）下午，许多被扣的共产党员就恢复了自由，情形开始好转。蒋介石对我说：“中山舰是受海军局命令开进黄埔的，‘事变’的责任主要在李之龙身上，现已将李扣押在经理处，交给你去审讯。”蒋因我当过东征军的军法处长，所以要我做帮凶。

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是在3月19日后半夜被陈肇英等率兵逮捕的。李新婚不久，在梦中被拖出来，上身只穿一件衬衣，下身只穿一条短裤，双手反绑，眼睛蒙起，嘴巴塞住，像架“肉票”那样把他弄到经理处。我向经理处处长徐樾等出示蒋的手谕之后，开庭提审二

次。李之龙连称冤枉，对所谓“通同共产党劫持蒋介石之事”坚不承认，同时一再申明：“中山舰开进黄埔，是由于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朱一鸿，亲自来海军局向我传达蒋校长的口头命令，说该校急需使用中山舰，着速开往黄埔停泊候调，这是17日下午的事。乃于18日早晨，命令该舰驶去黄埔候差。”等语。除此之外，再也审不出其他口供。当晚，我向蒋介石报告审问情况。蒋对我的报告很不满意，气愤地说：“那么你去将朱一鸿逮捕起来吧！”我看他的神色不对，只得随风转舵，轻轻地回答：“如将此事看得太严重也不大好。”蒋的表情没有什么反映，也不再提起逮捕朱一鸿之事（朱驻省城专管招待及船艇事务）。他沉默了一会，又说：“你一个人审问不了，加派第二军军法处长戴贞纘会审。”

第二天我和戴贞纘在经理处碰头，事前研究了怎样进行审讯。戴说：“李之龙不肯承认，是刁猾。”他主张用刑讯，我坚决反对，结果没有动刑。经会同庭讯多次，仍无所得。于是我用书面向蒋介石建议：“李案叠经会审，仍无充分罪证，原报告是否完全属实，有待调查，拟先准保释。”蒋介石的批示是“暂行看管，再侦查。”此案就是这样搁起。李之龙被移押何处，我不知道，直到7月间才把他释放出来。

四 “事变”的结局

经此事件之后，汪精卫经常称病不视事，各方面也对蒋介石颇有不好的评论。蒋在这时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进行北伐；并且顾虑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一事，会引起苏联的反感，会影响苏联对军事上的援助（其时苏联有一批枪弹要运来）。因此，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去见汪精卫，承认错误，并请汪转向苏联顾问鲍罗廷解释，因为当时汪和鲍比较亲近。但蒋对事件的责任则又全部推在李之龙和其他部属的身上，表示要“严加处分”。据闻，当时汪对蒋的态度也很冷淡。

同年4月9日，蒋介石致汪精卫信上说，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他在辞职未获批示的期间，军纪废弛，整顿无方，遂致一发不可收拾；其次是“我兄（汪）于3月初召集孙文主义学会会员讲话时，有‘中国革命不成，又欲杀共产党乎’之语，以致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的恶感，迫使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举。”云云。从这里可以看出，蒋是如何来掩饰自己的阴谋诡计而把责任推到部属身上了。接着，他就对“中山舰事件”作出了所谓“处分”。实际上只是李之龙无辜下狱，真正吃到一些苦头，而对于他自己的亲信人员则无非是一出愿打愿挨的“苦肉计”而已。当将王柏龄解除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职务，陈肇英免去虎门要塞司令职务，均着即离开广州。欧阳格也被免去暂代中山舰舰长，吴铁城免去新编第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均送往虎门炮台“软禁”。

蒋介石作出“处理”时，曾召我到他的“公馆”中，就叫我坐在他的办公桌上起稿子。当时我觉得吴铁城等罪责不轻，向蒋请示。蒋答：“就用图谋不轨的罪名吧！”蒋介石所一手制造的风波——中山舰“政变”事件，至此告一结束。

自此而后，汪精卫眼看蒋介石的声势逐步咄咄逼人，他因为不甘心做傀儡主席，就在同年4月中旬弃职出国。

汪精卫走后，蒋即支持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会主席改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继任；蒋即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谭是好好先生，他兼任第二军军长，要受军事委员会节制；而蒋对于张，根本无所顾忌。事实上他们都是傀儡。党、政、军大权从此就为蒋介石所控制。而在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后，蒋介石以缪斌为党代表，第一军就成为他的清一色嫡系部队了。

当汪走了之后，蒋介石曾经叫我将政局变化情况，用密电通知徐孚和陈肇英等。因此，我对“中山舰事件”的内幕，就更为明了。蒋既大权在握，就处心积虑地为实现其独裁的政治野心而积极创造条件。及至北伐取得胜利，他就悍然背叛革命了。

（家属吕德懿提供）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

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蒋介石合谋发动的桂系军阀首脑之一。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国内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我写这一篇资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实真相，可能写得不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够的，希望读者指正并严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乘专轮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见了面。他取出一份蒋介石

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给我看，内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决定同去上海。他说，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我说，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监视很严，我们行动要秘密。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她劝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须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胡子，坐了一只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轮船泰山号。

在泰山号船上，我同李济深见了面，同行的还有冯祝万（那时他是参谋长还是财政厅长，已记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我们当晚10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码头上秘密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买办有联系（他的老婆是香港某买办的女儿），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经由他办好了。我们下了省港轮船泰山号，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庇亚士总统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我们在船上也作了几次秘密谈话，内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记录。陈孚木是廖仲恺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们担任秘书。

4月2日上午，邮船驶入黄浦江，还没有泊码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谋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轮到船上前来迎接我们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们说，租界里万不能住。他说：“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他们同租界里的外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白总指挥要你们两位到他的总指挥部去住。”我们就乘小火轮直接开往设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我们在小火轮上看见满江外国兵舰的大炮都摆

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情况的确相当严重。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码头上迎接我们，李宗仁也住在总指挥部里。

三

在我们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蒋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们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诬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从而，我的结论自然

也是“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诬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二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晖的发言满口无锡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说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谬论。他的话我虽然不太懂，但是当时我对他这个人还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他是“理论家”（蒋介石称他为国民党的“瑰宝”）。陈果夫不大说话，我同他是第一次会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部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

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个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栗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企图扑杀革命的反动阶级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而我们这几

个桂系军阀头目追随蒋介石合谋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从此开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查阅当时上海报载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参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现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街略)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下略)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四月二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三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看来，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是一贯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人耳目的。

最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摘武汉国民党左派“不合者”二事，列举“可痛心者”九事。电文最后说：“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詎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纓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

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帮会流氓以及我们这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